

2016—2020 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热点及趋势研究

——基于我国五大外国文学研究权威期刊

王大鹏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过 40 余年的探索和发展, 随着全球化和社会更迭的加快, 研究热点和趋势也处于快速更迭变化之中, 因此每隔五年一次的研究趋势分析尤为重要。2016—2020 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异彩纷呈的五年, 此期间,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态势, 从更微观的文化单元透视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研究趋势, 以及人类世时代特征研究新动向, 体现了国内学者关注现实问题、全球议题和人类生存的学术伦理关怀。

关键词: 外国文学研究; 跨学科; 文化单元; 人类世;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I1 - 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2) 02 - 0120 - 07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22. 02. 018

A Study 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0: Based on the Five Authoritative Foreign Literature Journals in China

WANG Dap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207)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more than 4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are changing rapidly as well, and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nalyze research trends every five years. 2016 - 2020 is a splendid period for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presents the following trend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trend, the study trend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vents from a microscopic cultural unit, and the new trend of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thropocene, which reflects the academic ethical concern of domestic scholars for practical problems, global issues and human survival.

Key words: the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units; the Anthropocene; globalization

一、引言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起步于 1978 年, 截至今日, 已经走过了 44 个年头。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进程中, 国内著名长江学者乔国强教授认为,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也顺势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引进探索期、世纪之交的前进勃发期以及新时代的蓬勃繁荣期^[1]。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国内大批高校及研究所

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蓬勃发展, 加之国家对高质量科研人才培养的支持,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者, 大大推进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21 世纪, 信息爆炸式增长、新思想不断涌现、研究热点快速更迭, 因此, 对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每隔五年的专门梳理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立足于对国外文学的研究, 旨在通过引进国外经典, 汲取人文思想精华, 以促进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国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和思辨能力。基于

收稿日期: 2021 - 11 - 26

作者简介: 王大鹏 (1989—), 男, 云南昆明人, 2020 级在读博士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语言和国际交流优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长期处在与国际文学文化互动交流的对话之中，在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交流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内目前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学术期刊主要集中于《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五大南大核心期刊（CSSCI）。上述五大权威期刊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风向标，能够较好地反馈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和态势，故本文拟对2016—2020年上述期刊的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同时结合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学界背景，综合考量刊发文章，以期梳理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有效的预测和推断，为国内外外国研究学者提供参考。同时，本文也将指出笔者在整理文献过程中所勘测到的国内研究的不足，以期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经过了4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大批学者在实践中不断地钻研、摸索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之路，同时通过对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引进，21世纪以来的研究方法日益成熟、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研究内容也变得日益新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学者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之路和研究范式。经过梳理和总结，笔者发现，2016—2020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如下趋势：首先，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多地试图超越其学科限制，转而尝试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跨学科的研究态势明显；其次，外国文学研究关注于从微型文化单元更细致微观地审视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具有回溯过去，审视当下的趋势；最后，外国文学研究关注人类世时代语境之下的人类生存状况，考察网络、科技、信息所引发的伦理和生态问题。

二、跨学科研究态势

“跨学科”的概念起源于1926年，用于指涉超越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从事的涉及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研究。^[2]然而，该概念却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在国内被首次明确提起，并于1985年在北京召开首届跨学科学术讨论会，然而由于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于彼时刚刚起步，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

面临的首要任务仍为外国文学的引进、译介和梳理工作。可以说，跨学科的概念踏至国土已久，但是却一直“只闻其声，不见真身”，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研究虽有过少量尝试便偃旗息鼓，气数式微。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日益成熟，并深受国外研究方法的浸染，尤其是随着“新文科”的提出，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尝试重新抬头。这一点在近五年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会议和五大期刊的刊文状况中可窥一斑。

相对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较为活跃，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文化历史学、政治文化学等等。文学是一种与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学联系紧密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跨学科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文学研究也踏上了跨学科的研究之路。一些广为学者熟知的跨学科文艺批评理论被广泛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例如将文学与心理学知识融合的精神分析法、从历史视角研究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与生态学结合的生态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与性别、种族结合的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等等。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国内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只是单纯的依托在西方业已成熟的跨学科文艺批评理论，并未主动寻找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契合点”与“共振点”，缺乏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这种现状才开始有所改善。国内学者杨亦鸣自2010年便开始尝试将脑神经科学与语言关联，试图在脑科学中找到人类语言的思维路径，并开创了“语言神经学”这一交叉学科。2020年杨亦鸣将语言学、医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进行交叉，提出“临床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建构思路^[3]。无独有偶，2013年国内著名学者聂珍钊首次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刊登《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一文，将文学语言与大脑记忆形式进行结合，讨论文学中的脑文本现象。聂教授认为，脑文本作为一种文学传播的基本形态，在文学研究中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此举为文学与语言学、脑神经学融合的典范。^[4]据笔者统计，2016—2020年，仅仅《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便刊登了7篇有关脑文本的文章，加上《国外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CSS-

CI 学术刊物的发文章量,脑文本相关研究达十余篇,足可见其科研的前沿性和引领性。主要的研究者们也大多从伦理学与脑文本的维度展开讨论,但是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尚必武教授着重于讨论脑文本在文学叙事中的演绎过程,并结合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作品展开脑文本视域下的叙事研究,推进了脑文本的文学叙事功能,具有较大指导意义。^[5]

福柯对权力与空间的阐释,可以说是当今外国文学研究老生常谈但历久弥新的话题。从空间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并不新颖,但是将地理学与文学进行结合,却较为新潮,为近些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另一前沿话题。2013 年,国内学者郭方云教授将文学与地理学中的地图学进行交叉,提出文学地图学的概念^[6]。文学地图的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譬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有别于以往按照时间线或国别分类的文学史编撰方式,于 2005 年通过对罗马、都柏林、伦敦、巴黎、纽约、圣彼得堡等文学重地地图景观的考察,以地图的形式梳理了世界文学。郭方云的文学地图学则以更加微观和细致的角度从地图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探究英美文学中隐秘的叙事、主题和权力关系,具有极大的实用型和学术指导意义。据笔者统计发现,近 5 年来,郭方云教授关于文学地图学的相关研究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重要 CSSCI 期刊的发文章量高达 6 篇,并且可发现国内对文学地图的研究呈现逐渐火热状态,以“文学地图”为主题在 CNKI 检索^①,CSSCI 发文章量在 2016—2020 年间为 29 篇,2011—2015 年间为 23 篇,2007—2011 年间为 21 篇,而 2003—2007 年间仅为 12 篇,2003 年以前为 0 篇。由此可发现,文学地图相关研究在国内从 2013 年开始呈现出进军之态,并保持了逐年火热之势。

疾病是文学中一个亘古久远的话题,不论是对人类历史上疫病历史的还原,还是对文化的疾病隐喻,文学中的疾病意象层出不穷。自然,作为一种将医学、病理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研究方式,疾病书写也成了一种较为小众却新潮的研究视角。据统计,五大外国文学研究期刊仅 2020 年一年就刊发

疾病相关文章 6 篇,多以文学中的疾病书写来探讨国家政治、文化病理、殖民话语和叙事伦理等话题。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国内举办的多次学术会议均提到侧重疫病书写,或直接冠以疫情文学的标题。如 2020 年 11 月由杭州师范大学组织的世界文学云论坛,以“在疫情时代阅读世界文学”为主题;2020 年 12 月 26 日由北京大学组织的第二十七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直接以“疫情文学与叙事医学:传记文学的新潮流”为题,探求疫情困境之下新的文学研究之路;2021 年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的预备通知里,也明确提出侧重疫病和疾病书写;同时,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也把疫病书写作为其中的一个条目。

由此可见,近些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的意识渐强,学者们结合国内国际历史文化语境,既有从语言、神经科学和文学的交叉研究,又有从空间研究发端日益钻研而创新提出的文学地图学,更有结合当前全球卫生健康环境和人类普遍关注点并结合医学、病理学的疫病书写。这些尝试为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提供了参考和前进方向。

三、从小的文化单元勘探历史、 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研究趋势

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中指出文学四要素,并且还指出文学具有对现实模仿的功能。^[7]诚然,文学对社会、历史和世界的表征作用毋庸置疑,而优秀的作品则更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开阔的视角,在观照历史中透视现实,在文学创作中映射社会,在刻画当代生活的变迁时具有普遍的指涉。”^[8]国内知名学者杨金才认为,21 世纪世界文坛发展趋势中仍然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烙印,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却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却成为一股勃发力量参与着 21 世纪的世界文学流变^[9],具体表现就是对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关注变得尤为关切和细致。笔者经过对 2016—2020 年五大外国文学期刊以“政治”和“历史”为主题的发文章量统计研究发现,五大期刊总刊文量 2 238 篇,其中以“政

①检索日期:2021 年 2 月 22 日。

治”为检索主题，共刊文190篇，占据总发文量的8.5%；以“历史”为检索主题，共刊文257篇，占据总发文量的11.5%。可见，《外国文学评

论》对“政治”和“历史”主题尤为关注，不管是以“政治”还是“历史”为主题进行检索，均占据了总发文量的14%以上（见表1）。

表1 以“政治”“历史”为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期刊名称	总发文量/篇	以“政治”为主题		以“历史”为主题	
		发文量/篇	所占比例/%	发文量/篇	所占比例/%
外国文学评论	264	38	14.4	42	15.9
当代外国文学	584	36	6.2	70	12.0
外国文学	534	49	9.2	61	11.4
国外文学	290	38	13.1	30	10.3
外国文学研究	566	29	5.1	54	9.5
总计	2238	190	8.5	257	11.5

注：数据来源于2016—2020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五大期刊。

作为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领头羊和权威，《外国文学评论》的刊文倾向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王守仁教授在2020年6月举办的“新世纪外国文学趋势发展研究高层论坛”中指出，21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出现了“现实主义转向”，但更具有兼容并蓄的态势，究其根源，其实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真实的追求^[10]。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文学研究对人类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持久关注，恰恰说明了其现实主义的研究转向。

细究来看，近些年来学者们倾向于从更微观的文化机理去勘测政治话语，还原历史真相，并指导当下现实。可以说，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依旧是热浪期，但是却趋向于从一种更微观细致的文化载体透视大的国家想象和政治诉求。如我们可以在2016—2020年的发文中找到诸如身体政治、园林政治、巫术与政治、美食与政治、头发与政治、服饰与政治、文化政治，等等。例如，国内学者肖明文透过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饮食习俗，阐释了饮食话语背后隐含的国家身份政治诉求，彰显了具有德意志特性的饮食符号体系在其群体内部隐性的“集体无意识”及饮食实践中映射的德国政治意识^[11]。华中师范大学王辰晨认为美国非裔的发型演变体现了非裔群体在身体受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规训中的政治觉悟与政治抗争之路^[12]。饮食、发型、服饰、家庭等微型文化单元作为一个透视镜，映射的是国家想象、政治诉求、群体身份构建等。

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大的官方历史中淹没的小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与记

忆，尤其对大的历史事件、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的真实性持有怀疑态度。因此，记忆研究作为一种反历史的研究策略变得火热。记忆作为一种有温度的历史，具有建构性、当下性和再现性等特征。特定群体诸如族裔群体、战争受创群体、灾难见证者群体等基于被遗忘的历史和记忆，致力于建构其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并疗愈其群体历史创伤，寻求历史正义。国内学者的记忆研究着眼于对小的群体记忆碎片，用以还原真实有温度的历史记忆。据笔者统计，2016—2020年间，以“记忆”为主题进行检索，《当代外国文学》发文35篇，占总发文量的6.0%；《国外文学》发文11篇，占总发文量的3.8%；《外国文学评论》发文7篇，占总发文量的2.6%；《外国文学研究》发文26篇，占总发文量的4.6%；《外国文学》发文19篇，占总发文量的3.6%。从上述数据可看出，记忆研究的发文量大概维持在4.4%左右。记忆与历史紧密相关，根据表1已知，五大期刊以“历史”为主题检索的发文量，占比达11.5%。综合以上两种统计，可发现以“记忆”与“历史”为主题的发文量占比在4.4%~11.5%之间，仍然具有较高的刊文比例。具体来看，其发文内容多与创伤、身份、历史等话题相关联。其中，种族创伤记忆、大屠杀创伤记忆、战争创伤记忆和后“9·11”创伤记忆为其中的热点话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2016—2020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仍然关注在文化研究方面，体现出对历史题材，尤其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创伤事件的关注，如战争、屠杀、阶

级、性属、种族等社会问题,呈现出对现实主义的研究转向。其次,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则倾向于透过微观细致的文化机理来窥见群体身份认同和国家政治想象等宏观伟大的社会话题。再次,研究者们普遍关注于大的官方历史书写中被遗忘和掩埋的个体的或群体的记忆,以期还原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正义,并探求创伤记忆的疗愈之路。最后,研究者在关照历史和记忆的时候,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并注重回归现实,考察历史和记忆给予当下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呈现出近些年来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良好趋势。

四、人类世时代特征研究新动向

人类世的概念起初并不是一个文学领域的术语,它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于2000年首次提出,用以指涉人类在地球系统和地球生态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造成的地质变化等各种影响,并将持续对地球系统产生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13]。2015年英国著名学者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教授在其专著《生态批评前沿:以人类世概念切入》(*Ecocriticism on the Edge: The Anthropocene as a Threshold Concept*)中首次正式将人类世的概念引入生态批评,从而拓宽了生态批评的时空维度,建构了一种更全球化、更贴近当下世界关注话题的文学研究视角。^[14]国内关于人类世时代特征的研究始于2015年,彼时,国内学者夏永红在其文章《环境人文学:一个正在浮现的跨学科领域》中首次将人类世的环境地质学概念引入到人文学科中,并梳理了环境人文学的跨学科动态^[15]^[37]。而国内对人类世相关生态研究的领军人物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姜礼福教授。姜教授从2017年开始在国内CSSCI刊物共刊发了4篇文章,对人类世的文学批评角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姜教授在其文《人类世生态批评述略》一文中梳理了人类世生态批评的核心要义,并对此批评视角的发展空间展开了讨论,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16]。2020年,杨金才界定了人类世在文学中表征的时代特征,即毒物书写、危机书写、技术叙事、新自然写作与动物文学等,展现了人类对科技文明的反思及其人类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生态意识^[9]。结合姜礼福对人

类世生态批评的界定,可以发现人类世的阐释视角包括:非自然叙事或动物叙事、灾难书写;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征、更为广泛的世界主义意识、科技与机械叙事伦理、后人类主义思想等。

人类世的视角聚焦于人类与地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弱化人类之间的差别、人类与物的差别,倡导反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地球系统的友好相处模式。于是,作家们在叙事中的物化倾向便是其特征之一。国内关于动物叙事研究较为突出的学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尚必武教授,自2015年以来,其在CSSCI期刊中发表非自然叙事相关文章共9篇,其中五大外国文学研究核心期刊共4篇。他认为,非自然叙事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包含了非人类叙事(non-human narrative)^[17]。统计发现,2016—2020年,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五大核心期刊对非自然叙事相关文章的刊文量为8篇。由于2015年非自然叙事的概念刚刚从国外引入,故国内相关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纵观国内其他CSSCI期刊,可以发现江西师范大学的唐伟胜教授也关注非自然叙事,并提出“物叙事”的概念,用以指涉文学作品中叙述者的拟物状态。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家、区域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联系更紧密、界限也变得越发模糊,故人类世视角主张弱化区域、国家、大陆之间的界限和区分,试图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以更为广阔的眼界去透析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强调一种研究中的全球视野。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曾繁森和程相占教授从中国哲学中的“杀生”弊病观点入手,提出“生生美学”的哲学观,并结合当下人类世的语境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语境,将人类视作以地球为宿主的病毒,反思了人类与地球的共生关系^[18]。2014年起,国内学者殷企平教授开始在外国文学领域讨论共同体的思想,并于2016年编写了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为国内共同体概念理解的加深和理解误区的矫正提供了重要参考^[19]。随后,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共同体思想研究便纷至沓来。笔者以“共同体”为主题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五大期刊的发文量自2000年以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其真正的研究热潮自2011年以后才开始,并保持着成倍增长的研究热浪(见表2)。

表2 以“共同体”为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单位：篇

期刊名称	2000—2004年	2004—2010年	2011—2015年	2016—2020年
	发文量	发文量	发文量	发文量
外国文学评论	0	0	4	9
当代外国文学	0	0	5	8
外国文学	1	2	2	9
国外文学	1	1	3	4
外国文学研究	0	3	5	8
总计	2	6	19	38

注：以2000年以来每5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统计。

人类世时代除了关注人类物种与自然、动物、和地球的关系之外，也格外关注对科技、机械、网络、新媒体和都市生活的反思。21世纪科技与信息日新月异，爆炸式地发展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可以说人类世时代是人类迅速腾飞的时期。科技、机械、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以及都市的快速扩张，造就了全球人类新的议题，如科技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网络媒体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摧残、都市生活对人类伦理和原初人性的挑战等等。由此，国内学者们在文学研究中也格外关注科技、媒体和都市在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表征和深切关怀，表现出对人类世时代下人类与科技文明、人类与新的媒体形式、人类与都市生活的重新反思。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普遍倾向于关注人类与疾病、病毒、自然灾害以及全球公共安全事件等。如2021年10月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山东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年会”的主要议题就包括了“当代外国灾难文学研究”“人工智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等。2021年12月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专题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也包含了“中美城市文学书写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灾难文学研究”（侧重疾病、疫病书写）和“跨媒介研究”等。从两个会议的议题可以发现，后人类时代的科技反思、新媒介反思、灾难书写、疾病书写等研究为当前的研究新动向，预测接下来五年内将会有较好的发展态势。

总之，在人类世的时代语境下，其关键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物、人类与疾病、人类与灾难、人类与人类的衍生物，如科

技、新媒体、都市等。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跳脱了以地区和国家为界限的历史文化语境，强调人类作为地球系统中的核心元素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关系。作为新型的研究视角，人类世的研究角度因其与当下的全球化语境紧密相关、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全球关系治理导向，在文学作品中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在文艺理论中也有较为灵活的结合度，因此发展前景广阔。

五、展望与反思

总体来说，2016—2020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异彩纷呈的五年。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学者对国际学术动态、国际全球化语境和当下历史文化语境的持续关注。首先，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社会、环境、卫生与科技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单纯的学科内部研究的局限性凸显，于是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在国内迅速拥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加之国际间学术信息交流的便利，近些年来，跨学科的研究尝试在国内呈现出蓬勃之势。通过整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在将文学研究与脑科学、神经学、病理学、医学、地理学和环境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可借鉴的经验，具有指导意义。其次，随着国际交流和跨界旅行的普及和日常化，群体文化意识凸显，文化间性问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人们倾向于从个体或群体的眼光来审视文化和政治，参与到政治话语和文化建构中来。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持续关注，促发了学者们对新型历史叙事策略的思考。因此，国内学者倾向于从更加微观的文化单元来透视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更为细致地审视历史在文

学中以服饰、饮食、发型等微型文化机理的表征形式,以期汲取历史养分,指导沉重的现实,呈现出后现代现实主义转向。最后,在人类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地球系统的关系、人类与其衍生物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另一话题。于是学者们进行了人类世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新尝试,将之与生态批评进行结合,拓宽了其研究视野。同时,人类与科技、新媒介和都市的关系都成为国内学者竞相反思的话题。可以说,人类世的时代特征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养分,而人类世的研究视角也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与文艺理论融合的条件,具有较大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

然而,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首先,虽然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紧跟国际学术脉搏,但国内的学术敏锐度较国外仍处于滞后状态。较为新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大多由国际学者提出并讨论数年以后,才被国内学者引进,在国内加以探讨。其次,虽然研究视角起步于国际,但是部分国内学者的讨论明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甚至超出国际学者,但是却多在国内期刊发表相关文章,缺乏与国际学者的对话性。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外国语言方面的专家,语言水平较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实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可以发现,国内学者诸如浙江大学的聂珍钊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尚必武教授等学者已经尝试在国际上发表相关学术文章,与国际学者对话,为国内学者做出了较好的模范。最后,研究中的理论和文本西化倾向明显,即用西方的研究视角来研究西方的文本,得出的也是基于西方传统的阐释。故笔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立场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虽然我们可喜地发现,国内学者更加关注历史和记忆对沉重的当下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真正的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如果能凸显中国立场,更加明确对中国当下的指导效用,文学的教诲功能便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乔国强. 1978—2018: 外国文学研究 40 年的回顾与反

思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10): 7—14.

[2] 刘仲林. 交叉科学时代的交叉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1993 (2): 9—16.

[3] 杨亦鸣. 中国临床语言学学科内涵与科学架构 [J]. 语言科学, 2020 (6): 561—578.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 (6): 8—15.

[5] 尚必武. 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冲突: 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人工智能与脑文本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9 (5): 61—74.

[6] 郭方云. 英美文学空间诗学的亮丽图景: 文学地图研究 [J]. 外国文学, 2013 (6): 110—117.

[7]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M]. 郅稚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 金莉. 20 世纪末期 (1980—2000) 的美国小说: 回顾与展望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2 (4): 87—97.

[9] 杨金才. 21 世纪外国文学: 多样化态势鲜明 [N]. 文艺报, 2017-09-04 (7).

[10] 丁兆国. 阐述学术前沿, 引领学术方向: “新世纪外国文学趋势发展研究” 高层论坛综述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0 (3): 174—176.

[11] 肖明文. 船长的餐桌与“亚瑟王的圆桌”: 《愚人船》中的政治美食学 [J]. 国外文学, 2019 (3): 136—143.

[12] 王辰晨. 《梅丽迪安》中的头发与政治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8 (2): 132—141.

[13] THOMAS, ADENEY J. History and Biology in the Anthropocene: Problems of Scale, Problems of Value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4 (5): 1592.

[14] TIMOTHY C. Ecocriticism on the Edge: The Anthropocene as a Threshold Concept [M]. London: Bloomsbury, 2015.

[15] 夏永红. 环境人文学: 一个正在浮现的跨学科领域 [J]. 国外理论动态, 2015 (1): 37—45.

[16] 姜礼福. 人类世生态批评述略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7 (4): 130—135.

[17] 尚必武. 非自然叙事学 [J]. 外国文学, 2015 (2): 95—111.

[18] 曾繁森. 跨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中国“生生”美学 [J]. 东岳论丛, 2020 (1): 98—108.

[19] 殷企平. 西方文论关键词: 共同体 [J]. 外国文学, 2016 (2): 70—79.